

《明诗综》诗学批评述要

李 程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清初学者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是明诗总集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种,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明代诗歌文献,同时也具有突出的诗学批评成就。在批评态度方面,从总体来看,《明诗综》基本做到了“持平”,具备独立的批评立场、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面对有明一代诗人、诗作,《明诗综》所采取的批评方法主要有追源溯流、比较相衡和摘句评点。《明诗综》诗学批评焦点饶有意味,分别为“《击壤》派”、程嘉燧以及公安与竟陵。态度、方法和焦点作为描述《明诗综》诗学批评的三个层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反映出朱彝尊明代诗学批评的完整统一与内在矛盾。《明诗综》的诗学批评观念和诗学批评实践,既是朱彝尊诗学的重要组成,又与顺、康诗风演变和诗学转向相呼应,成为考察清初诗学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明诗综;朱彝尊;明诗总集;诗学批评

作者简介:李程(1986—),男,安徽砀山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资助项目“清初明诗总集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042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5-0146-08 收稿日期:2015-02-05

作为清初学者朱彝尊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收录有明一代诗人3338位,诗作10165首,卷帙百卷,堪称明诗总集中的煌煌巨制。清末学者张宗泰评价《明诗综》:“大率每人之下,先列前贤之评论,而以己所作《静志居诗话》附于其后,或纠弹其偏曲,或增益其本事,或摘录其名句,不激不随,粹然一出于和平。其无可附丽者,亦不强为论说。尤足贵者,每举一事,辄元元本本,有伦有要,而其才学之渊博,实足以副之,不惟有资于谈诗,兼有资于说史,洵一代总集之翹楚矣。”^{[1]3843-844}李慈铭称扬此书“巍然为诗教指南”^{[2]1215}。从《明诗综》的诗学成就及对

其后明诗总集编撰的影响来看,张宗泰与李慈铭所作评价洵非过誉之辞。

《明诗综》编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经朱彝尊手自校定,康熙四十四年(1705)序而刊行。在此集之前,选辑明诗而著名者已有顺治初年刊行的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对于《列朝诗集》甄综阙漏、持论偏颇等弊端深为不满,有意补阙矫枉,二人诗学观念的差异也由此而体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清初虞山派诗学仍然承续了晚明诗学的余绪,较多受到公安派影响,主张“本性情,导志意”,批判七子派的模拟,同时又倡导“学古”和“师心”的统一,力图建立新的诗学传统。

清初顺治朝诗学主张以“性情”为本者,除虞山派与钱谦益之外,还有诗派如云间、西泠,诗家如陈子龙、黄宗羲等。陈子龙《青阳何生诗稿序》言:“明其源,审其境,达其情,本也,辨其体,修其辞,次也。”参见《安雅堂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末刻本。黄宗羲《寒村诗稿序》言:“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参见《南雷文定》后集卷一,清康熙刻本。

至康熙朝,受学术风气影响,诗风和诗学皆有所转捩,渐趋醇雅。朱彝尊以“博综”著称,在经学、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提倡诗歌创作应以学养作为根柢,尊崇儒家诗教,批判公安、竟陵的空疏浅薄,与钱氏诗学大异其趣。《明诗综》编撰的旨趣所归,即树立一种与《列朝诗集》相异的,更为合乎“公论”的明诗批评体系,这与彼时官方话语对于钱氏贬抑排斥的倾向也是一致的。

既然是以《列朝诗集》之偏颇作为批判对象,《明诗综》总的批评态度自然以“持平”作为目标,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之中,却又存在个人批评倾向以及《列朝诗集》的“焦点对话”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偏颇,这些都在传统的诗学批评方法的框架内展开。态度、方法和焦点共同构成了描述《明诗综》诗学批评的三个主要层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反映出朱彝尊明代诗学批评的完整统一与内在矛盾。

一、“持平”的诗学批评态度

四库馆臣所撰《明诗综》提要言:“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每人皆略叙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下,各备载诸家评论,而以所作《静志居诗话》分附于后。虽隆、万以后,所收未免稍繁,然世远者篇章易佚,时近者部帙多存,当亦随所见闻,不尽出于标榜。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于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3]2662-2663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亦持相似的观点:“尚书钱牧斋《列朝诗选》,于青丘、茶陵外,若北地、信阳、济南、娄东,概为指斥;且藏其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而孟阳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此犹舍丹砂而珍溲勃,贵箏琶而贱鸣琴,不必大匠国工,始知其诬妄也。国朝朱太史竹垞《明诗综》,所收三千四百余家,泯门户之见,存是非之公,比之牧斋,用心判别。”^[4]这两段文字,一为官方话语,一为学者评论,皆以《列朝诗集》作为批判对象,对《明诗综》的批评态度予以肯定,其中凸显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持平”。

朱彝尊本人在写给好友王士禛的书札《答荆部王尚书论明诗书》中明确表达自己的诗学批评态度:

明自万历后,作者散而无纪。常熟钱氏不加审择,甄综寥寥。当嘉靖七子后,朝野附和,万舌同声。隆庆巨公稍变,而归于和雅。定陵初褫,北有于无垢、冯用韞、于念东、公孝与暨季木先生,南有欧桢伯、黎惟敬、李伯远、区用孺、徐惟和、郑允升、归季思、谢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群。即先文恪公不以诗名,而诸体悉合,窃谓正嘉而后,于斯为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类柴桑。且人伦规矩,乃钱氏概为抹杀,止推松园一老,似非公论矣。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论次稍详,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若启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之,非宽于近代也。^[5]卷三十三

《明诗综》所秉持的“公论”,建立在以《列朝诗集》作为对立参照的基础之上,对于批评态度的讨论,又集中于“松园一老”(程嘉燧)等批评焦点。从总体上来说,《明诗综》具备独立的批评立场、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基本做到了“持平”,而关于“《击壤》派”、程嘉燧以及公安与竟陵等批评焦点的评价,又矫枉过正,体现出批评态度的内在矛盾。

(一)独立的批评立场

诗人与诗作经过同时和后代的诗人、学者给予一定的评价后,便会有形抑或无形地影响着批评家的写作,“懒惰者”直接承袭旧的观念,文学批评很多时候成为一种话语的复制,批评的空间局促而狭窄,批评对象被贴上了“标签”,难以被真正认识。独立的判断和评价,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明诗综》大体能够不囿于前人、时人的评价,坚持批评立场,既反对誉之过实,也排斥毁之过实。

明人作诗本喜模拟前人,反映在诗歌批评上,批评家也经常有意将所评价的对象与前代诗人相提并论,其中难免出现过誉的评价,模糊了诗人应有的地位,朱彝尊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此表现出一种冷静的审视态度。李德作诗喜欢效仿李贺,他的好友孙蕡评价他说:“子诚混元皇帝孙也。”《明诗综》言:“其诗实与长吉相远。”^[6]411 老师对于弟子的揄扬,属于人之常情,然而人情因素的掺杂则会让评价不一定符合真实的判断。明初闽中十子的领袖林鸿,对其两位弟子黄玄、周玄赞誉有加,然而,在朱彝尊看来,“二子诗太荏弱,句续字凑,不能成家,似非孟扬、漫士、皆

山之伍。南皮李氏称二子诗,托兴悠远,殊不尔也。^{〔6〕435-436}这种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评价,以创作水平为标准,显然更为客观。《明诗综》仅选黄玄诗作1首,批评标准在选诗中得到了有力贯彻。卷四十七石星《诗话》:“少保虽与弇州声应气求,然风雅道远。弇州与阳曲王明甫齐进之‘续五子’之列。月旦如是,初不为千秋起见,止任一时之爱憎而已。”^{〔6〕2368}王世贞因个人喜好,将石星列入“续五子”,其诗则难当此誉。

与反对誉之过实相表里,朱彝尊对于毁之过实的批评态度亦有批驳。明初诗人杨翥有《晞颜集》传世,钱谦益评价其集曰:“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朱彝尊却认为钱氏“未免太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自成章。”^{〔6〕1046}李化龙作诗承袭王世贞、李攀龙一派,然能自有格调,深得胡应麟称赏。钱谦益于胡应麟诗学颇不认同,故对李化龙的批评态度“讥其醜厚肥腴,而弃之不予录”,朱彝尊虽对后七子的诗学批判颇多,却能够以公允之心,指出钱谦益“未免矫枉也”^{〔6〕2638}。

(二) 开阔的批评视野

在批评态度上能否做到“持平”,对于批评家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批评视野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狭窄的批评视野势必局限判断的准确度,只有在开阔的视野中,才能做到统观全局、综合评价,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

朱彝尊以“博综”著称,批评的视野也展现出博大恢弘的气象。卷七十四曹学佺《诗话》:

明三百年,诗风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闻闽粤风气始终不易。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粤自五先生后,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维敬、区用孺辈,犹是五先生之调也。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嶙然不滓,尤人所难。^{〔6〕3668}

有明一代三百年的诗风变迁,朱彝尊尽收于胸中,指点江山,分为风雅八变,有此视野之后,再观闽、粤诗人的创作之不变与小变,则具体到曹学

佺诗歌创作的批评自然公允。

《明诗综》开阔的批评视野还表现在对于诗人诗作的分体评价,不局限于一隅,衡量得当且持论平和。明人有较为鲜明的辨体意识,朱彝尊继承了这一传统,且运用在批评实践之中。张羽长于歌行,而五古、近体稍逊,《诗话》:“来仪五古,微嫌郁轡。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駉駉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蹠孟载。”^{〔6〕364}杨廉诗学陈献章、庄昶,朱彝尊虽对“《击壤》派”诗风极为不满,但仍能分体而评:“然其七言长篇,颇具排奭之力,五律亦以朴胜,不尽类陈、庄二公。”^{〔6〕1291-1292}对于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朱彝尊基本持肯定态度,收录其诗作80首,仅次于高启和刘基,位居第三,批评中又能分体一一指陈其各体之渊源、得失:“献吉五古,源本陈王、谢客,初不以杜为师,所云杜体者,乃其摹仿之作,中多生吞语。偶附集中,非得意诗也。至效卢、骆、张、王诸体,特游戏耳。惟七古及近体,专仿少陵;七绝则学供奉。盖多师以为师者。”^{〔6〕1484}

(三) 发现的批评眼光

汇聚一代诗人诗作的总集,编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批评眼光,尽量发掘被其他选家和批评家有意或者无意“遗忘”的作者和作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选和评的公平性和公正度。

朱彝尊对批评家有意“遗忘”的偏颇倾向常常提出质疑,指向也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在《列朝诗集》。《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郑明选诗作46首,《诗话》:“先生五言近体,全学高达夫;七言近体,全学杜子美。语不求工,而句锤字炼,卓然名家。是时汪伯玉、刘子威、冯元成、屠纬真辈,类守其壳,而遗其神明。其在西吴,徐子与、吴峻伯皆然。先生之诗,遂无人赏激者。”郑明选诗歌创作本有较高成就,囿于彼时风气,遂至称赏者寥寥,《列朝诗集》仅收录其诗作5首。朱彝尊对此甚为不满,“予故取先生之作特多,天下之宝,要当与天下共之也”^{〔6〕2836}。

文学史无意中“遗忘”的诗人诗作,朱彝尊往往能披沙拣金,避免遗珠之憾,以“特为表出”作为责任和担当所在。《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区大相诗作48首,数量在全集各家之中位居中上,朱彝尊对其评价颇高,《明诗综》因此自有“特为表出”之意:“海目持律既严,铸词必炼,其五言近体,上自初唐四杰,下至大历十子,无所不仿,亦无所不合。岭南山川之秀,钟此国琛,非特白金

水银、丹砂石英已也。”又云：“海目五言律诗，如纯钩初出，拂钟无声，切玉如泥。又如铙吹平江，秋空清响。顾虞山钱氏置而不录，予特为表出，取之稍溢焉。”^{⑥ J2821-2822}朱彝尊此举既为补阙《列朝诗集》，同时又隐含对钱氏疏失之微词。这种有意的发现，体现出《明诗综》向着“持平”方向努力的批评姿态。

二、三种典型的诗学批评方法

《明诗综》共收录有明一代三千三百余位诗人以及诗选一万多首诗作，如此丰富而各具特色的批评对象，对于朱彝尊来说既是可以充分施展“武艺”的平台，也是极具挑战的擂台。批评对象愈丰富，所呈现的文学史事实与细节愈复杂，对于批评家的要求也愈高。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几种典型批评方法的灵活运用，是朱彝尊应对这一挑战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包括追源溯流、比较相衡、摘句评点三种。

（一）追源溯流

“追源溯流”是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⑦ P59}这一批评方法在《明诗综》具体批评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明代文学主流倡导复古重模拟的历史实际密切相关。

杨维桢诗自成一格，明初诗人多有师法者，相沿成派，朱彝尊一一指陈源流，评价锱铢：“诗纯效铁厓，宜铁厓之倾倒也。至其病，过于繁艳，特择其淡雅者著于编”^{⑧ J496}；指出李羣：“得诗法于李季和，然季和犹为廉夫熏染”^{⑨ J527}；述及瞿佑更是饶有趣味：“明初诗家，以杨廉夫为祭酒。廉夫见同调，缀以评语，不曰牛鬼，则曰狐精。此王常宗论文，即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为廉夫所赏，拾其唾余，演为流派，刘士亨、马浩澜辈争效之。譬诸画仕女者，肌体痴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⑩ J921}然而，诗派流衍，源虽同而流或有变，以李梦阳一派而言，马汝驥诗学李梦阳，而风格有变：“由其体纯，存滓窳而舍神明”^{⑪ J1781}，虽然与王廷臣齐称，成就却差之千里；张含亦是学诗于李梦阳，却以杨慎为旨归，“然诗不尽出其流派，而一以用修为归”^{⑫ J1825}，其诗作堆砌字句，缺乏神韵，跟杨慎相比，也是远不及矣；李梦阳与何景明各自诗派并行，“曾未几时，而学李者渐少，宗何者日多”，尹耕诗宗李梦阳，朱彝尊评价：“学

李得其风骨者，前有凌溪，后有朔野而已”^{⑬ J2032}。

明人学诗多专宗一家，《明诗综》皆能指其本源。学陶渊明者如归子慕“其诗学陶而得其神髓，韦苏州后，鲜有其伦。诵之令人增陋巷簞瓢之乐”^{⑭ J2851}；屠廷机“诗亦有柴桑遗响”^{⑮ J3943}。学杜甫者如程本立“建文诸臣，文莫过方希直，诗莫过程原道。希直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为苏子瞻。原道之诗，刻意杜陵，下亦不失为陈简斋也”^{⑯ J749}；张昉“匏客多忧生之嗟，其诗原出老杜”^{⑰ J3424}。学李白者如王谊、王忬兄弟“皆能远师太白，一时之希声也”^{⑱ J997}；朱茂暲“明之诗家，学杜者多，学李者少；学李绝句者多，学李古风者少。第十五叔父，虽曾选中、晚唐人诗以行，然心慕手追，专师谪仙人者”^{⑲ J4090-4091}。

具备开阔的批评视野，《明诗综》能够审视诗人在不同时期师法的对象，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创作风格的转变。评屈大均曰：“翁山早弃儒服，托迹缙蓝，予识之最早。其诗原本三闾大夫，自王逸以下，多屏置不观。后复返儒服，入越读书祁氏寓山园，不下楼者五月，始具曹、刘、潘、左诸体。要之七言不如五言，五律胜于五古，至歌行长句无取焉。”^{⑳ J4074}这就避免了对于诗人风格来源的标签式评点，从而展现出更为细致的演进轨迹。

（二）比较相衡

盛行于魏晋的人物品评之风，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批评家对于诗人的比较相衡，《明诗综》既有同在一时的诗人之间的比较，又有齐名相称者的考量，还有父子兄弟的高下判断。

俯瞰有明一代，《明诗综》卷八收录高启诗作138首，位居全集之首，《诗话》：“侍郎跌宕风华，凤观虎视，造邦巨擘，所不待言。”而何景明却推举与其同时的袁凯并为明初第一，朱彝尊对此评价自是不肯认同，“试合诸体观之，袁自非高敌也”^{㉑ J297}。卷十六袁凯《诗话》中，他又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独海叟纯以清空之调行之，洵不易得。然合诸体观之，则不及季迪、伯温尚远，何仲默推为国初之冠，似非笃论也。”^{㉒ J778-779}

诗人齐名并称如“李杜”“元白”“苏黄”“建安七子”“大历十才子”等是古代文学批评中饶有趣味的一个话题。被批评家“组合”在一起的诗人，或时代相同，或地域相近，或酬唱相契，或风格相似。然而，同一名下的诗人未必旗鼓相当，仍然有高下之分。高启、杨基、徐贲、张羽四人诗

擅一时,时人目为“吴中四杰”,《明诗综》给四人分配了整整两卷的篇幅,其中高启独占一卷,对于其余三人,评价则有高下之别,称杨基:“孟载未洗元人之习,故铁厓亟称之”^{① 6 J348},选其诗49首;张羽五古、近体不佳,而长于歌行:“来仪五古,微嫌郁轳。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骏骏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① 6 J364},选其诗23首;徐贲之才气“方之高、杨、张三君,稍为未逮”,虽然如此,而“诗法砒然,森有纪律,长篇险韵,极其熨帖,颇有类皮、陆者”^{① 6 J374},选其诗27首。类似的比较相衡还体现于“北郭十友”“闽中十子”等诸多诗人的批评。

明代父子兄弟皆以诗名闻世者数量不少,如皇甫冲四兄弟、王璠三兄弟、王世贞兄弟、张凤翼兄弟、梅守箕父子、归有光父子等。《明诗综》卷四十五收录皇甫冲诗7首,皇甫湜诗35首,皇甫汸诗39首,皇甫濂诗7首,从选诗数量上已经大略可以窥见批评用意。综而评之:“四皇甫诗,源出中唐,兼取材于潘、左、江、鲍,清音亮节,净扫氛埃。高苏门、华鸿山、杨梦山而外,无有及之者。”^{① 6 J2234}皇甫冲四兄弟中,朱彝尊最为推崇的是皇甫湜和皇甫汸,皇甫湜《诗话》:“子安逸藻风飞,清文绮合,视子循工力悉敌,铢两未分。宜子浚之难为兄,而子约之难为弟也。”^{① 6 J2237}

(三)摘句评点

摘句评点滥觞于春秋时代的赋诗、引诗活动,至汉魏六朝,“摘句褒贬”开始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学批评方法,表现为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和批评倾向摘出诗人诗作之中的佳句进行品评鉴赏。《明诗综》虽在诗话后附有诗选,然而由于多数诗人选诗数量均在5首之下,诗选中的诗作难以完全配合诗话所要传达的批评观念,必须要求诗话包容更多的诗作信息,因此,摘句评点在《明诗综》中亦有较为广泛的运用。与批评态度相关联,摘句评点常常体现出朱彝尊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

诗名不显者未必无佳作,诗作不称者未必无佳句。韩宜可诗名不显,诗作也平庸无奇,《明诗综》选其诗1首,然其诗中偶或有佳句,《诗话》:“伯时诗见《沧海遗珠》。句如‘松迷鹤径浑无路,花暗箫声不见人’青天有月来今夜,白发无家度几秋’芳草东风沙上马,青山迟日柳边莺’均有思致。”^{① 6 J173}相似者还有韩守益:“中允无诗名,七言如‘幽禽晓聚岸花动,锦鲤春肥溪水温’柳

叶雨晴鹦鹉语,木棉风暖鹧鸪飞’隔帘花影散棠棣,何处鸟声啼栗留’,具有风致。”^{① 6 J179}茅大方诗集流传未广,诗多不为世人所知,其中亦有佳句:“集中如‘万山入汉秦关险,孤栈连云蜀道难’纵使火龙蟠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花间莺避春城仗,林杪僧归晚寺钟’万里不来青鸟使,千年空老碧桃花’,皆佳句也。”^{① 6 J759}此类评点,朱彝尊皆有存珠惜羽的眼光和用意。

三、有意味的诗学批评焦点

所谓“批评焦点”,即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持续关注的批评对象。这种有意识的关注,使得纷乱复杂的批评对象如同零星散落的微弱之光渐渐聚合在一个乃至多个焦点之上,从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取得夺目的批评效果。《明诗综》诗学批评涉及的问题繁多且范围广泛,朱彝尊有意识地将分散的批评话语集中于几个主要的焦点:“《击壤》派”、程嘉燧、公安与竟陵。

在批评态度上,朱彝尊以独立的批评立场、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总体上做到了“持平”,而具体到“《击壤》派”、程嘉燧以及公安与竟陵等批评焦点,或因为对于诗风的个人倾向,或因为与钱谦益诗学观念上的差异,有意寻求“对话”,力图矫枉。意气、偏颇参与到批评之中,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对秉持的批评态度有所悖离,这些焦点因此具备了诗学史话题的意味。

(一)“《击壤》派”

北宋理学家邵雍诗有《伊川击壤集》,开创了寓理于情的诗歌创作风貌,其后师法模拟者甚多。明代性理诗风盛行,邵雍诗成为一种典范,“《击壤》派”由此流衍。朱彝尊主张以经学为本,对明人心性之学的空疏本有不满,在其文学观念上亦有体现,《与武曾论文书》言:“然后知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① 5 J卷三十一},《答胡司臬书》指出:“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用于有用。执事诚欲以古文名家,则取法者莫若经焉尔。”^{① 5 J卷三十三}因此,以陈献章、庄昶等为代表的明代诗歌“《击壤》派”,自然在《明诗综》批评话语中成为一个“焦点”。

作为明初河东学派的开创者,薛瑄在诗歌创作上以《伊川击壤集》为师法。朱彝尊叹曰:“宜于诗亦宗《击壤》矣。而集中五言醇雅,有陶、孟、韦、柳之风。予尝谓宋之晦庵、明之敬轩,其诗皆

不堕宋人理趣,未见有碍于讲学,又何苦而必师《击壤》派也! ⑥ 3905 稍后于薛瑄的陈献章是理学发展中的代表人物,诗于明人中自成一家。湛若水在《诗教解原序》中说:“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⑧ 3699 追源溯流,朱彝尊指出白沙虽宗《击壤》,然实源出于陶渊明,“然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故所作犹未堕恶道,非定山比也。其云‘百炼不如庄定山’,盖谦辞尔。”⑥ 31019-1020 虽然陈献章与庄昶并称“陈庄体”,同为“《击壤》派”代表,于此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朱彝尊对于二人的高下判别。朱彝尊对陈献章的性理诗风还抱有一定的欣赏态度,其对庄昶则可谓深恶痛绝:“自尧夫《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康斋、白沙、定山,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是为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从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则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也。”⑥ 31200-1201 这段评论文字可以视作朱彝尊对于明初“《击壤》派”脉络流衍的一个大致梳理,除了陈、庄二人之外,罗洪先、吴与弼、湛若水等也赫然在列。

在《明诗综》的批评话语中,“《击壤》派”作为一种具备了鲜明特征的诗歌创作风格,常常发挥批评对象的参照作用。朱彝尊评价明初诗人王越曰:“威宁功纪旂常,盟申带砺,立功已足不朽。而于诗沾沾自喜,长篇奔放,如快马不受羁绁,未免有衔蹶之虞。虽意在取法盛唐,然往往流入《击壤》一派。”⑥ 31053 在这段评论里,《击壤》派还仅仅只是作为与盛唐诗风比列的诗歌风格流派。有的时候,作为批评者的朱彝尊则就不那么“持平”了。评倪光曰:“其学盖本于邵氏。《观梅》数诗,特娟秀,不袭《击壤》恶派。”⑥ 31172 称《击壤》为“恶派”,以此褒扬倪光诗风之娟秀洒脱,则是有意将“《击壤》派”作为一种批评倾向的对立,话语之中已然包含了个人倾向和主观褒贬的因素。

(二)程嘉燧

作为晚明诗坛“嘉定四先生”之一的程嘉燧,诗歌创作成就有限,名不甚著,之所以成为《明诗综》的批评焦点之一,原因在于朱彝尊不满钱

谦益对其言过其实的赞誉和揄扬。

程嘉燧与钱谦益结交早且相契深,《列朝诗集》收录其诗作215首,数量上仅次于张羽,居第七位。钱谦益依照元好问《中州集》编撰体例,谥程嘉燧为“松圆诗老”,《列朝诗集》丁集下程嘉燧小传曰:“盖孟阳之诗成,而其为人已邈然追古人于千载之上矣。其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每遇知己,口吟手挥,緜緜不少休。若应酬牵率猥骯说众之作,则薄而不为。”⑨ 35373 虽然钱谦益坦言其对程嘉燧的评价“非阿私所好者”⑨ 35375,然却有私心褒扬的意味。《明诗综》卷六十五收录程嘉燧诗作仅8首,评曰:“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悉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恧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毋类是与?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⑥ 33256 平心而言,程嘉燧诗作未必全无可观者。朱彝尊的这段评价,表面是贬斥孟阳诗作,实际乃是针对钱谦益的偏颇批评态度而发,未免意气用事,有矫枉过正之嫌。史承谦《青梅轩诗话》对此已有所谈及:“其于程松圆诋之太甚,以矫钱氏之失,然君子论诗文平心乃可,正不必有意低昂也。”⑩ 3卷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曰:“(朱彝尊)又以牧斋力推孟阳,称为松圆诗老,故訾之尤力。集中五古深秀之作,以及七律之高婉、七绝之温丽世所传诵者,一首不登,此则选政之失平,矫枉之过正,故为异议,遂近褊衷,致一代之制作不完,使所选之常留遗憾,是可惜也。”② 31193 沈德潜则一以雍容平和之态调和争执之两端,不偏不倚,确称“持平”:“孟阳诗亦娟秀少尘。自钱牧斋訾訾李、何、王、李诸人,推孟阳为一代宗主,几与高季迪、李宾之前后相埒矣。而阳羨邵子湘有心矫枉,摘其累句云:‘争倚画桡冲妓席,独横朱袖占歌筵’亦知终去婚和嫁,且恋闲来弟劝兄,‘近逐歌喉须闯席,闲开笑靥待歌船’闲偎串迹圆留面,戏剧鞋痕曲印肩’年去贫来不自由,暗伤颜面向交游’等句,谓其秽褻俚俗,几于身无完肤矣。予录其气清格整去风雅未远者四章,见孟阳自有真诗,勿因牧斋之过许,而毛举其疵以掩之也。”④ 3260

与程嘉燧同时并称的唐时升,亦在“嘉定四先生”之列,《列朝诗集》对其评价不高,在朱彝

尊看来乃是钱谦益有意贬之以抬高程氏：“嘉定四先生诗文，要当推叔达第一，长蘅、子柔且逊席，矧孟阳乎？牧斋谓其放笔而成，绎其辞，乃追琢而出者。由其欲伸孟阳，故有意抑之尔。”^{〔5〕3251}以诗歌创作成就而言，未必可以遽言唐时升必高出程嘉燧，朱彝尊的这种比较与排序，也是有意为之。卷六十五范汭《诗话》中也有类似的比较：“东生诗才娴雅，如灵犀结佩，可以辟尘。方之孟阳、允兆诸君，觉尤腾拔。”^{〔6〕3262}究其本质，《明诗综》对于程嘉燧的持续批判，根源于朱彝尊力图矫正钱谦益“阿其所好”批评态度所引起的是非不公。由此观之，程嘉燧之所以成为《明诗综》的批评焦点之一，与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本来并无太大关系，更多的乃是朱彝尊藉此有意识地主动与钱谦益寻求批评态度的对话，而在这场话语博弈中，同样显现出其矫枉过正的偏颇倾向，颇为耐人寻味。

（三）公安与竟陵

公安与竟陵是晚明标举性灵的两个重要流派，公安派力图矫七子派之弊，倡导独抒性灵，诗风却流于俚俗，竟陵派旨在矫公安派之弊，却以幽深孤峭作为美学追求。朱彝尊强调诗歌创作应以学问为基础，其《斋中读书十二首》曰：“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5〕卷二十一}在他看来，虽然公安与竟陵都反对模拟复古，以抨击七子派为目标，但是或浅率或幽晦的诗风乃愈变而愈下，正是明诗衰歇的结穴所在，两派诗学之根本弊端，皆为“空疏不学”：“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6〕3277}

以朱彝尊对两派的批评态度而言，其于公安派尚能保持批评的理性，对竟陵派则是直斥为亡国之音，批判之激烈可谓前所未有。袁宗道被朱彝尊视为晚明诗风转变的始作俑者，对袁宗道《诗话》曰：“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欲以李长吉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欲以尤、萧、范、陆体变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长卿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苏各有

神采，顾乃颓波自放，舍其高洁，专尚鄙俚。钟、谭从而再变，泉音缺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魅齐见。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邪。”^{〔6〕32772}作为公安派的发起者，袁宗道学诗以白居易、苏轼为宗法，取二人性灵之纯，而其才不足，仅能得白、苏之浅易，后继者袁宏道、袁中道稍胜，而陶望龄、江盈科诸人则远逊于三袁。因此，公安派在朱彝尊看来未免有“专尚鄙俚”的弊病，这一评价并不过分。对于竟陵派“泉音缺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魅齐见”的批判，却是在还未分评此派之前即表明了其鲜明的个人倾向，与《明诗综》总体批评态度“持平”的追求，已有悖离和偏差，表现出批评态度的内在矛盾性。

朱彝尊《斋中读书十二首》之十二有自注：“先太傅初闻袁中郎、钟伯敬论诗，叹曰：‘安得此亡国之音。’惨然不怿。”^{〔5〕卷二十一}竹垞对竟陵派的批评态度与其曾祖一致，亦有“诗亡而国亦随之矣”的论调。卷六十收录钟惺诗仅4首，评曰：“《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螭、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6〕33017}竟陵派钟、谭并称，谭元春诗作也仅选2首，朱彝尊对谭氏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钟、谭并起，伯敬扬历仕途，湖海之声气犹未广，藉友夏应和，派乃盛行。《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蚓窍蝇鸣，镂肝铄肾，几欲走入醋瓮，遁入藕丝。充其意不读一卷书，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为亡国之音也。”^{〔6〕3331}

公安与竟陵虽风格迥异，派分为二，然而具体到《明诗综》的批评语境，在朱彝尊的有意安排下，作为晚明诗风典型的两派常常相伴而出现，二者聚合在一个批评的焦点，即“楚人之咻”。对于公安和竟陵的批判，包含有朱彝尊对于晚明诗歌的深入思考，但是其中个人诗学倾向也较为明显，以批判为主，语词激烈。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于此亦有微词：“其于公安，略有采取，而集中五律、七律，名句駉駉，十不存一。伯敬、友夏五古、近体，亦有佳者，竟以妖孽绝之。”^{〔2〕1193}

四、结语

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和朱彝尊《明诗综》为代表的清初明诗总集编撰和明诗批评,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清人谈明诗,多在牧斋、竹垞二家的话语框架之内。《明诗综》后出,既有纠偏矫枉的旨趣,有意区别于《列朝诗集》,又力图以此构建新的明诗批评框架。在批评态度上,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所言“公论”,四库馆臣对于《列朝诗集》的批判恰恰也是针对“公论”,所谓“公论”,实际即为康熙朝官方话语对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介入与影响,朱彝尊曾应博学鸿词之试,充明史纂修,《明诗综》可谓其诗学批评与官方话语的耦合,自然得到四库馆臣“持平”的评价。从总体上看,较之《列朝诗集》,《明诗综》的批评态度确实要客观、公允得多。具体到批评实践,尤其是明代诗学的“焦点”,朱彝尊被压抑的个人批评倾向始时有表现,如对于“《击壤》派”、程嘉燧的批判,及至公安派、竟陵派,意气愈胜,且有意寻求与钱谦益的“对话”,偏颇倾向与其批评态度的总体追求在细节方面构成了内在矛盾。细节展现批评的张力,却不影响总体判断,以全集而言,《明诗

综》的批评态度仍然可谓“持平”,批评的“焦点”也因此成为有意味的诗学话题。

追源溯流、比较相衡与摘句评点等典型诗学批评方法的灵活运用,作为《明诗综》诗学批评的重要构成,显示出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传统的传承性和适应性,其后成书的明诗总集如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等在诗学批评上也延续了这一传统。面对数量庞大的诗人诗作,通代或者断代诗歌总集的编撰,文献汇辑不易,批评文字的写作对于编撰者亦是挑战与考验,对《明诗综》批评方法的思考,可为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提供方法论的启发。

《明诗综》在明诗批评史上突出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来自彼时官方话语的有意褒扬,更为重要的则是其在视野、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诗学批评成就,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清初学术的博大气象和实证学风。从诗学批评的发展来看,《明诗综》作为一部大型断代诗歌总集,在诗学批评上体现出朱彝尊对于明代诗史较为成熟的思考,带有总结意义,这也是清代诗学的基本特质之一。时至今日,《明诗综》仍然是我们认识明代诗史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诗学批评著作。

参考文献

- [1] 张宗泰. 鲁岩所学集[M].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5.
- [2]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0.
- [3] 永瑢, 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4] 沈德潜, 周准. 明诗别裁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5] 朱彝尊. 曝书亭集[M]. 上海: 上海涵芬楼, 1922.
- [6] 朱彝尊. 明诗综[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7] 章学诚, 著. 叶瑛, 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陈献章. 陈献章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9] 钱谦益. 列朝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0] 史承谦. 青梅轩诗话[M]. 清刊本.

[责任编辑: 杨雅婕]